

风物 深度

## 中国“老干部体”文艺同温层如何形成？写过《难忘今宵》之后的乔羽

这个同温层因有各级官媒官刊为发表平台，又有庞大党组织，一年到头都有参加不完的活动，虽与外界脱节却可一直运转下去



2014年12月21日，一名身著军装的妇女在北京的一个公园聚会期间带领人们唱共产党爱国歌曲和传统音乐。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胡又天 发自台北 | 2022-09-13

胡又天：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博士，师从朱耀伟及周耀辉教授研究华语流行歌词。关注两岸三地时局、思潮与文风。

编者按：在“局里局气”“厅里厅气”成为中国当下审美主流类型之一的时候，文本上难免让人想起盛行多年的“老干部体”。这一以中共老干部做人、讲话风格为基准来创作诗词的中国本土流派，有其自身特色。本文续接上篇[《中共红歌推手乔羽的秘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好听是例外吗？》](#)，是为下篇，借由这位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词作家入手，解析老干部体由来、存在、流行之时空次元。

当中共在1980年代打开国门，乔羽一辈人也迎著改革春风，老怀安慰地拾起本领再出发。彼时，世界上以欧美为首的流行音乐，已经在这二三十年里缔造了数以千计的传奇，生发了百来种新思想、新乐种。即便是只融汇了其中一小部份的港、台歌曲，一旦涌入神州大地，也已足够令人耳目一新再新。相对于港台歌曲的多彩多姿和谱系更多、功法更繁的西洋音乐，中国共产党文艺界“广大创作队伍”（他们的常用词）仍须格于党性的些许创新，自是有限得很。

## 老干部次元vs“通俗歌曲”

新中国自建政起便长年存在一种被称为“老干部体”的文风，来源就是源源不绝的老干部，其表现多为意态谆谆、语重心长的老生长谈，或感恩载德、傻乐傻乐的大小确幸，作诗则往往套话连篇、语言粗疏，甚至逢迎谄媚、贻笑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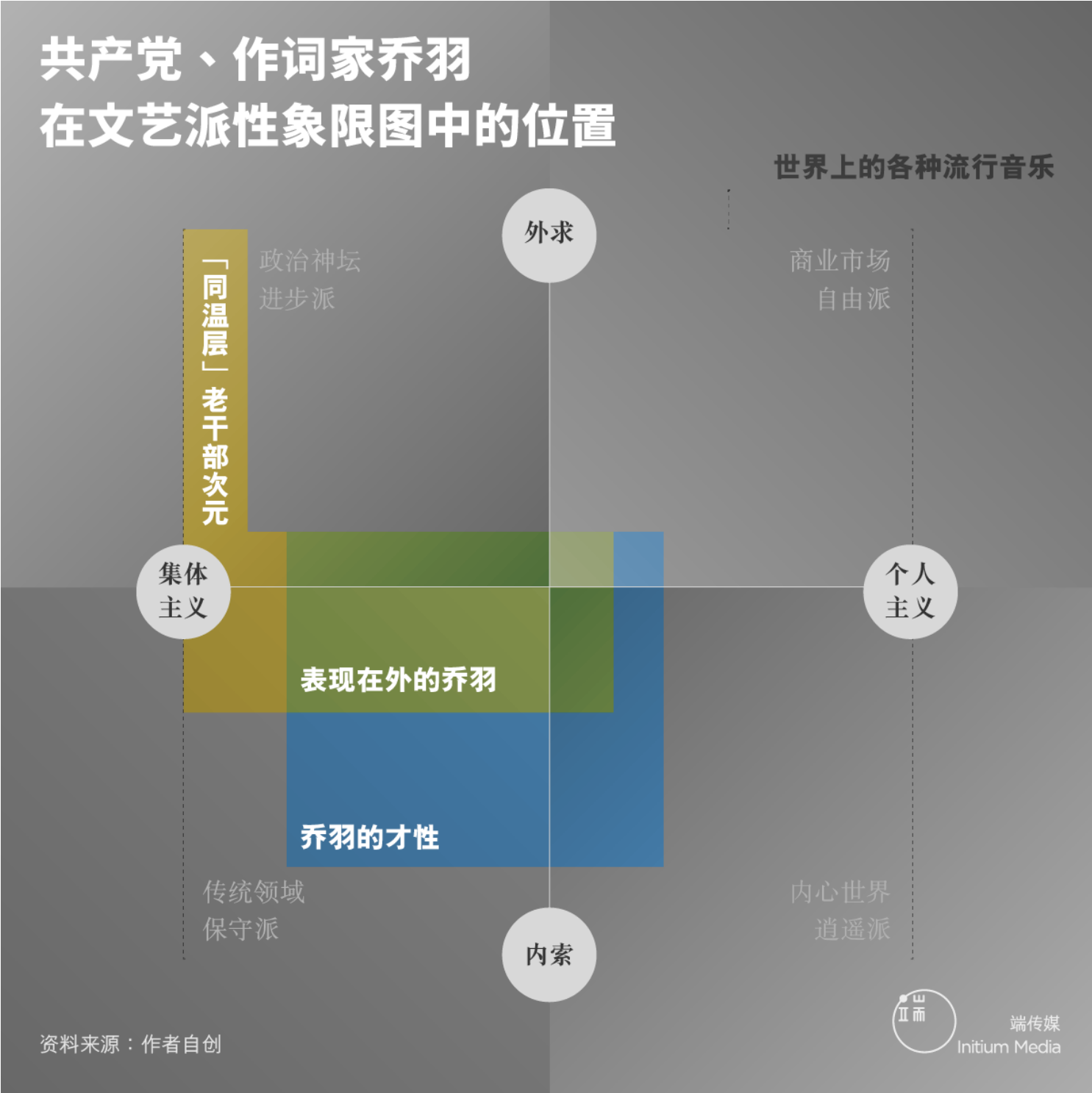
1986年，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掀起“中国摇滚”潮流，下至普罗大众、上至思想界专家学者，皆不乏为之狂热迷醉的共鸣者。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及其背后更多种几乎完全不同，深具挑战性和颠覆性的音乐和思想，居于“正统”的乔羽如何看待呢？

我没查到。

新华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12月的《乔羽文集》，分文章、诗词二卷，文章卷大多都是为人作序、会议致词等应酬文字，其中涉及到“体制外”音乐界的，只有〈《通俗歌曲卡拉OK演唱技法》序言〉一篇。乔羽很克制地从客观形势上肯定了“通俗歌曲”（这是体制内为回避“流行歌曲”一词的资本主义气息而定出的叫法）的存在“不是少数人的喜爱问题，而是多数人的需要问题”，然而完全不评论具体的哪种论调或哪首歌，只讲一些普通的道理，也不好猜那底下有他什么不便明言的真实意见。

在此之外，对80至90年代已能轻易接触到的各种来势汹汹的外国音乐，对中国摇滚，乔羽完全不谈。也许谈过，但文集里没有一篇提到。我只在他和高中生的演讲记录中看到 he 自承“外语没有学好”，这可以部份解释对外国音乐的沉默：不乱批评不懂的事物。而对本国的新潮也沉默、克制，那除了才性上的不相通、政治上的谨慎，还有什么可能的缘故呢？

或许可以用一张图表辅助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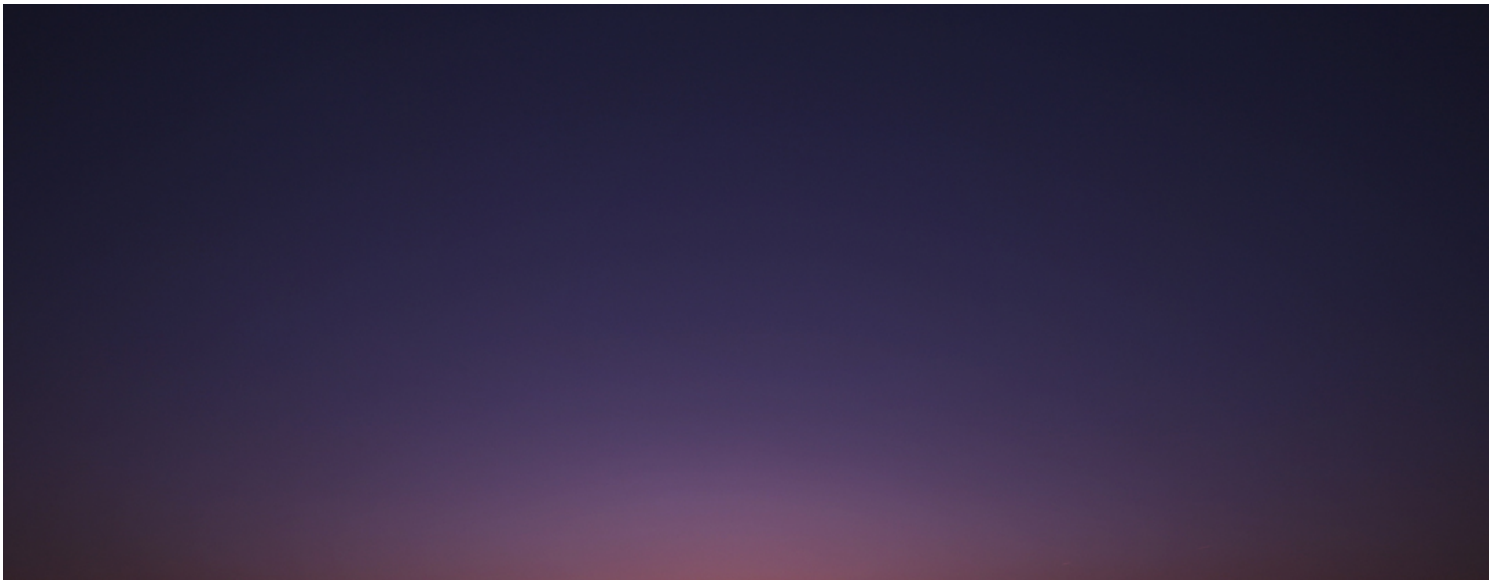


“老干部次元”叠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尘嚣之上，不像现役干部和困难群众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现实，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气定神闲的余裕，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情、顾忌影响，故往往倾向回避敏感议题。

我把“中共体制内文艺工作者的认知界限与认可范围”或曰“体制内文艺工作者能写、能谈的范围”命名为“老干部次元”(Laoganbu Dimension)。新中国自建政起便长年存在一种被称为“老干部体”的文风，来源就是源源不绝的老干部，其表现多为意态谆谆、语重心长的老生长谈，或感恩载德、傻乐傻乐的大小确幸（比小确幸多一个“大”是因为他们缺不了政治上的大局观），作诗则往往套话连篇、语言粗疏，甚至逢迎谄媚、贻笑大方。

然而这个同温层、舒适圈，因为有各级官媒、官刊为发表平台，又有庞大的党组织，包你想玩的话一年到头都有参加不完的活动，故可在与外界脱节的情况下一直运转下去。常有一句骂人、损人的话“活在自己的世界”，但如果那个“自己”人数庞大、基础稳固，人就没什么办法了。就像日本动画、漫画、游戏及其受众发展出来的一些舒适圈，在十几年前得到了一个诨号式的统称“二次元”（相对于现实的“三次元”），“老干部次元”也叠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尘嚣之上，不像现役干部和困难群众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现实，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气定神闲的余裕，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情、顾忌影响，故往往倾向回避敏感议题。

“老干部次元”除了自己乐呵，也往往在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学术界、中央电视台起到制约作用。我查阅各种新中国音乐、文艺的相关论著时，就看到了大量在问题意识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对红色经典和老前辈则充斥必要的谀词之水货。你到中国知网检索“乔羽”的相关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赞美、赞美、再赞美；就算要讲问题，推给外部环境，说句“非战之罪”，结论“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也就是了。还可以查到2006年有一本十数万言的《乔羽论》，我能在网上读到的内容片段也是如此。在电视台和报纸，就更可一言以蔽之：你好、我好、大家好。





2013年2月22日，北京日落后的中央商务区天际线全景。摄：Feng Li/Getty Images

## “词坛三杰”：黄沾也并列？

1990年代以后，随著改革开放市场化潮流的继续推进，当然也包括1989民运后许多人不再对体制内的文艺抱有期望，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的风尚和相关书写，已经几乎完全和“老干部次元”割裂了开来。而根基在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老干部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需求与动机。

如图所示，音乐上，“老干部次元”能接受的歌单大概是：

“传统领域”－雅化（经文艺工作者整理改编）的民歌、部份原生态民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刘三姐》之类；

“商业市场”－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流行歌曲、儿歌，如乔羽2003年写的动画主题歌〈少年英雄小哪吒〉；

“政治神坛”－他们最熟悉的革命歌曲，如〈我的祖国〉；

“内心世界”－〈思念〉、〈夕阳红〉（详后文）。

你把这界限之外的东西拿给他们听，即便不反感，大概也要抓瞎，他们长年局于党性的习惯思维和语言里面，就没有或者说早被去除了能够欣赏那些异质的审美神经。近年央视为了“与时俱进”，偶尔也刻意安排老辈歌唱家和新世代流行歌手同台演出，结果就经常显得尴尬。

大陆媒体流传过一个“词坛三杰”的说法：大陆乔羽、香港黄沾（1941-2004）、台湾庄奴（1921-2016）。同意这讲法的人很少，但它怎么来的呢？把“老干部次元”的口味套进来一看就明朗了：首先，乔羽毋庸置疑。黄沾是因为写过〈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时内地匮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侠剧、时装剧主题曲也写得很有古风，这两点就足以忽略黄沾其他比较时尚、放荡，和党

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庄奴则首先是因为邓丽君，再来他的才性与思想的确和乔羽一辈差不多，甚至可说除了不是共产党以外，就是一样。庄奴也本就出身大陆（生于北京，祖籍河南），1992年续弦后也回到了大陆定居重庆，也给大陆的电视剧写了歌词，也出席各种活动，从统战角度来看完全就是一个完美的“久别重逢的兄弟”。2005年中秋，庄奴和乔羽也在央视安排下联句合作了一首〈月儿圆〉，又是一段佳话。至于罗大佑、崔健之类以及其他更离经叛道的，您就别拿来扰乱和气了。

乔羽在“内索”的向度上有著比这个界限深邃一些的才性，但他始终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从来没有脱离过，自亦不免受其制约。

或者说，除了有著远高于一般水平的素养与成就之外，乔羽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干部——参与过一些大事，经历过一些风浪，而一直没什么实权，如今云淡风轻，偶尔再写写东西。《乔羽文集》文章卷收了很多给体制内同辈、后辈的歌词集、论集所写的序文，除了少部份名人之外，还有很多名字我都没听过，找了其中一些来看，水准实在不怎么样。诗词卷中，也有许多并未谱成歌曲、内容也和寻常“老干部体”赞美诗差不多的平凡之作。

黄沾是因为写过〈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时内地匮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侠剧、时装剧主题曲也写得很有古风，这两点就足以忽略黄沾其他比较时尚、放荡，和党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以乔羽的资历和地位，如果他愿意正面回应时潮对固守一隅的“社会主义艺术”和“党性”构成的挑战，或藉“中国歌词研究会”等组织的名头催动一下，应该多少可以带动一些同志打破“老干部次元”对自己视野和耳界的遮蔽，也给新中国音乐史留下更多时移势易之际的智慧指引。然而，从结果来看是没有。

1990年代以后，随著改革开放市场化潮流的继续推进，当然也包括1989民运后许多人不再对体制内的文艺抱有期望，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的风尚和相关书写，已经几乎完全和“老干部次元”割裂了开来。新一代创作者和乐评人有著太多更够劲的东西可学、可谈，也能直接依循“文化工业”的机理，在市场上面对听众见真章，再不必与体制内的那一套等量齐观，也不必去求取那些老干部的认可、庇护了。相对的，根基在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老干部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需求与动机。

我读过一本出版于1991年的崔健歌曲论集，作者中亦不乏老干部，藉“中国摇滚”现象反思过去各种错误和现仍存在的问题，写得很深刻，我想可以说那是央视尚且一统天下，体制内作品还和港台流行共用著“通俗歌曲”这一名堂，从而使歌曲尚且具有高度政治风向标意义的1980年代的最后回响。再之后，就各玩各的



了。一直要到近十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渐有“都听”的普通网友或自媒体会在华语歌曲的话题下把两者放在一起谈，或拿经典红歌来贬斥当前娱乐圈的劣作与乱象，我才越来越常警觉到，乔羽一辈的影响确实仍然深深存在，并不只有党媒和老干部的自说自话。



1997年10月31日，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在北京演出。摄：David J. Coulson/AP/达志影像

## “最怕过于含蓄，也最怕没有含蓄”

这“五寓”之说，显是脱胎于传统诗学，而辅以“对立统一”这些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来的辩证思考法，历经长年的“通俗化”实践而成立。

然而，回到乔羽所熟悉而能说得上话的领域，他还是很有一些能穿越不同时空而普遍适用的智慧结晶。且看他的歌词创作经验谈：

根据我的艺术经验，音乐文学创作有如下几条规律：

第一，寓深刻于浅显，即把深厚的情感或思想用一种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

第二，寓隐约于明朗。比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一听就明白，所以才能产生力量。

第三，寓曲折于直白。歌词必须直白，让人一听就懂。其曲折是在直白中自然表现出来的。

第四，寓文于野。艺术有文、野之分，但歌词必须是通俗的，并且要寓雅于俗，把很“文”的东西用一种“俗”的方式表现出来。

雅与俗、文与野、曲折与直白、明朗与隐约、深刻与浅显是几对辩证关系。它们相互对立。而一旦几个对立得到了统一，好歌词就写出来了。一些好歌有味道，越琢磨越有意思，就是因为词作家做到了以上几方面的对立统一，在制约中创造了美。以上关系处理不好的歌很难成为好歌。太文雅让人听不懂，太粗野显得没有美感。

这“五寓”之说，显是脱胎于传统诗学，而辅以“对立统一”这些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来的辩证思考法，历经长年的“通俗化”实践而成立。我也写了很多年歌词，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的确是可以辅助创作的真知灼见，决非空话。

乔羽又说：

如果一首歌只有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它一定是单薄、空洞、没有意境的。写歌词最怕过于含蓄，也最怕没有含蓄。如果问我为什么每个时代都能写出让人接受的歌，我想那只是因为我在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心来写作，所表达的都是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不会脱离所处的时代，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结合时代、挖掘深意，虽说这是很普通的心法，但乔羽明言了“最怕过于含蓄，也最怕没有含蓄”，也就说明他是有意识地在以这些原则来写作，大家可以来索隐。只是，如果是墙内、体制内的同学、作家来索，索来索去，都还得投合“老干部次元”的口味，结果也无非又是连篇累牍的赞美和崇敬。而体制外和墙外人士，又有什么动机去索他一个毕生都是忠贞党员的隐呢？除非你还有一些沟通两岸三地的志愿，或者还有一些儒家情怀。

1990年代，山东开始搞“国际孔子节”，也请乔羽写词，乔羽写了〈孔子赞歌－活在众生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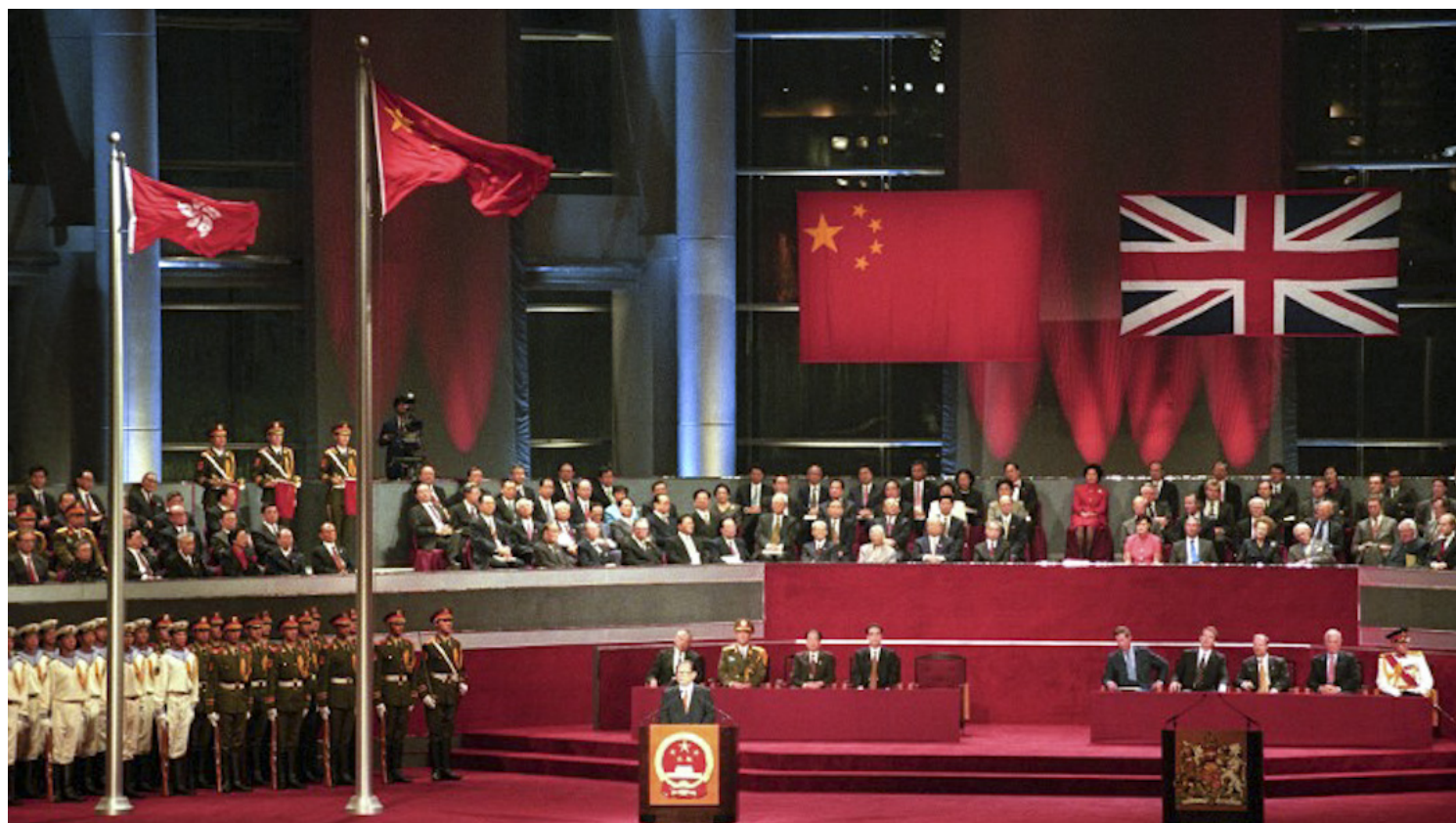
百年千年万年 昨天今天明天  
多少乱世英雄 总想把你打翻在地  
多少在位君主 却爱把你捧上九天  
你仍旧是你  
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  
你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  
你永远活在众生之间



历史上除了太平天国和中共，没有多少政权、军阀会特意针对“孔家店”的，乔羽在此故意无视这点，或曰卖个破绽，结合后句来看，便可说是暗讽那些借由祭孔来刷政绩、堆虚荣、招观光、销预算的地方政府了；后文再把孔子从神坛拉回人间，提示大家去关注人家的本质、本相，一方面消解千年来的道统之争，一方面报答了自己的旧学传承，再一方面，乔羽应该也有些自况的意味，希望大家不要神化自己，拱去做招牌。我只找到这首歌的曲谱，不知具体唱起来怎么样（我试用电子琴弹了一下，不太好听），不过提到这词的文章，也没有一篇在谈音乐，今后治儒学和思想史的同学应该也不会。音乐在此的确不是重点。

这里又可提到乔羽作品相对于商业流行歌曲一项较大的差异：他是“词先曲后”居多。通常是人家先请乔羽写好歌词，再去请作曲家（或请乔羽连系）谱曲。业界则通常是“曲先词后”，少数能包办者亦可“词曲并进”。三种方法都可以出好歌，一人包办词曲也未必优于二人分工，但在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曲迁就词、词迁就曲，会有不同的沙石。以“词先曲后”来说，像“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这种语句就很难谱得好听，作品和作者的才性也决定他们不会出什么奇招，何况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任务，所以成品从音乐上看来就很乏味。

但话说回来，这一回乔羽是用“人性”领导了事实上处于混乱状态的“党性”，亦可谓回归了儒家的“善颂”传统，做了个球。台上致词的人愿意顺著这个思路往下讲的话，即可做到“善祷”。官方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就不考察了，然而在2000年代以后的“国学热”中，确有不少讲孔子的，是努力将他放回“常人”的视野来考察，包括他和弟子是如何谋生（如李硕《孔子大历史》），这也便算是一种和乔羽“心同理同”的呼应，从“党性”来说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摄：Torsten Blackwood / AFP

## 当老干部写“香港回归”

“老干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后是愈趋“离地”的。1997年时内地媒体报导香港回归，又当然是一水的爱国主义叙事，尽管那几年香港公众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续问题；至于什么国族情感、雪耻扬眉，你若一味高唱此调，人家只会觉得你“藕线”。

1997年，香港回归前，广州市委组织了一场“97大合唱”创作活动，也请到乔羽。乔羽写了序歌后的第一首〈问国耻谁雪〉：

山垂泪，水呜咽，国门破，金瓯缺。  
朝廷怯懦，订下了一款款卖国条约，  
列强猖獗，将我神州圣土一块块分割，  
坐使我黎民百姓，蒙屈受辱，水深火热。  
中华民族记著，五千年历史途程，有光辉灿烂也有悲壮惨烈。  
问湛湛苍天，国耻谁雪？  
问沉沉大地，国耻谁雪？  
问举国兄弟姐妹，国耻谁雪？国耻谁雪？

我见此词，大为傻眼：这也是乔羽？“朝廷怯懦，订下了一款款卖国条约”这种句子，根本不适合谱曲吧？当然也是可以硬干，但那就只能让歌唱家在台上表演，别想流行了。检索到一个2012年的演唱版本，果如所料，是央视音乐台常见的那种交响乐伴奏的艺术歌曲。他们的确很有一套硬功夫，再生硬的口号、教条都能认真处理到宏大、激昂，你如果愿意沉浸到他们那个情境里去，兴许还真能有所触动。但你愿意吗？

就文辞来看，这也完全没有做到乔羽自己提出的“五寓”。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场创作活动显然是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办，那“中港融合”就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是不是应该考虑港人的想法和反应？那几年只要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或看过一些影剧、报刊，就知道公众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续问题；至于什么国族情感、雪耻扬眉，当然也不是无人不在乎，但你若一味高唱此调，人家只会觉得你“藕线”（粤语“神经病”）。

乔羽不了解这些吗？我查阅资料，又辗转询问了一下乔羽在“九七”前有没有去过香港，答案是没有。《乔羽文集》里有云“我得写我自己的感受”，亦有一篇〈国耻我们雪〉讲述了这词的由来：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是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中度过的，而今天新一代青少年已有不识雷锋者，“看来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于是秉持著责任感写下了〈问国耻谁雪〉。

读过此文，结合乔羽没去过香港这点，我推测：他是真的不了解当时的香港舆情。

他平日的生活圈，所读所见，大抵都在内地的“老干部次元”中，而当年内地媒体报导香港回归又当然是一水的爱国主义叙事，那么，讲究从生活经验来创作的乔羽，写出这样一首缺了香港和港人视角的歌词，也就不足为怪。他是真诚的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应该写这些；而后来直到今天，中共和内地爱国群众对于香港人的离心离德，也仍是“还必须大大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见占绝对主流。

乔羽说“我不会脱离所处的时代”，但从实情来看，只能说，他没有脱离“老干部次元”，而“老干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后是愈趋“离地”的，所以如果地上人和异地人拿乔羽晚年作品来对照这一番话，大概也只能摇摇头了息。

我没查到香港人对这首歌以及“97大合唱”的其他曲目有什么评论、回响，原因我想也很简单：党八股，不值一谈，自动屏蔽了。如今“爱国者治港”新特首上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板上钉钉的事，此类逢五逢十都可以翻出来再演几遍的大作，可能也会被收入将来的音乐课本，同时介绍乔羽先生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词家。所以，为让将来的同学多一点全面的了解，不要因为被搞坏了胃口就一意抵触，本文的写作应该还是有些必要的。

## 党要靠“老干部次元”来撑场

在中国，人们怀念50年代和80年代，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作为尚能自治，后来发生的事还没发生的那几年。过来人有记忆，新生代也透过历史与音像来向往，乔羽一辈遂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干部次元”无法自拔的党，也就要反复乞灵于他们来撑场，在年复一年富丽堂皇的回响中，暂时忘却今之广大队伍在此分众时代的文艺战线上，从认知到答题的全面脱节。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又从容

夕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最美不过夕阳红(1993) 词：乔羽 曲：张丕基

有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网路上不时有人为喜爱的动画歌曲角逐“二次元国歌”的名头；如果“老干部次元”也要来评个几首“国歌”的话，那就应该算上乔羽这首〈最美不过夕阳红〉了，它也真是央视一档老年人专题栏目《夕阳红》从1993到2010年的主题曲。

晚年的乔羽，与世无争，温馨从容；偶尔受访，上上电视，也维持著小心谨慎、谦退自守的作风。他在访谈中曾表示希望墓志铭上就写“这里埋葬著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那他事实上写了几首呢？有报导说是一千多首。然则确切的数量是多少？有谱曲配唱的成品占多少，只有歌词的又占多少？这是个很容易在“老干部次元”讨好的课题，应该不用担心无人整理。



中国大陆词作家乔羽，于2022年6月20日逝世，享寿95岁。网上图片



体制内音乐家、电视台所能给予的装配和演绎，风格是缺少变化的，精神上或许也或许从根本就未能领略乔羽的隐约之处。

2003年，乔羽在文集卷末写了两句座右铭：“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几年后又加了一句：“不为浮名所累”。表面看，这些只是很寻常的警句；结合作者的生平和他本应能再多做一些的事情，反过来看，或许就可以说，这积习之蔽、时尚之惑、浮名之累，正是他难以克服的困扰。难以克服，那怎么办呢？按最近的流行语来说，他是“躺平”和“共存”了。

积习之蔽，即“老干部次元”从艺术到学术上的各种局限与自我局限；时尚之惑，即中国持续“走资”到新世纪“入世”后层出不穷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老矛盾新难题；浮名之累，组织还需要他，积极方面是指望他继续发挥余热，消极方面是别添麻烦。尽管乔羽的党性一直都很好，但若如果这等有历史地位的大老真要杠上什么，那对首当其冲的单位来说就是很恐怖的事。便如崔健在2002年发起“真唱运动”剑指从央视到各等现场表演的对嘴假唱风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当时如果乔羽这些老同志也加进来一起施压，面子就会更难看。

乔羽也不是没有发过异议。《文集》中可见他不只一次地对当前的“民族声乐家”养成体制提出了批评：“……真正民族的东西应该有民族的灵魂，民族自己的语言，他的语言作为他的灵魂的一种表现，形成他自己的一种品格。我们现在光是在钢琴房里培养的歌唱家，就缺这个东西。”他呼吁：学院应该多从民间发掘、吸收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者，请他们来做老师，矫正体制内各种唯技术论、公式化、与群众脱节的倾向。

很多人都发过这样的议论，有些人到现在还在讲（如果还健在），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后也有不少跟著讲，可见讲了也是白讲。但既然讲了白讲，那就不讲白不讲。讲了要不要力推呢？或许也有推过一点吧，但毕竟已经退下来了，抵不过生态决定的趋势。或许也因为懂政治，看得清趋势，也就没去逆势。

人们怀念50年代和80年代，爱国主义教育 and 实际作为尚能自洽，后来发生的事还没发生的那几年。过来人有记忆，新生代也透过历史与音像来向往，乔羽一辈遂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干部次元”无法自拔的党，也就要反复乞灵于他们来撑场，在年复一年富丽堂皇的回响中，暂时忘却今之广大队伍在此分众时代的文艺战线上，从认知到答题的全面脱节。

乔羽的生平，有很多潜能未得充分发挥。乔羽的作品，他本人曾说，是有赖作曲家给歌词插上了翅膀才得以流行；他没说的是，在翅膀之外，还有编曲、演唱可以比作机壳和引擎，能否飞好又要看这整个机体适不适合当下的天气，而体制内音乐家、电视台所能给予的装配和演绎，风格是缺少变化的，精神上或许从根本就未能领略乔羽的隐约之处。

市有八坑，处定待可至丁氏问。或许，付不的干后亦公云山坑具外三代氏同月慈山及的，介的歌调的里和  
演绎，甚至重新谱曲；也或许，作出这样歌曲的，可以是在墙外。